

政教空間的形成

——清代滄浪亭御碑的意義與詮釋

葉 叡 宸*

提 要

滄浪亭自宋代蘇舜欽建成後，數度易主，屢興屢廢。清初由宋荦追撫舜欽當年構亭之意，以地方官的身分重修滄浪亭。宋荦的重修賦予了滄浪亭空間開放性，使園林從原本的私人性質轉化為一處公共的官方園林。既宋荦之後，吳存禮與安寧分別在園中設立了康熙、乾隆的御書石碑。此後，御碑成為滄浪亭顯目的景點，並透過其後官員的詮釋，賦予滄浪亭全新的空間意蘊。是而使得滄浪亭在休閒娛樂、遊觀觴詠以外，更同時具備地方教化以及政治治道的象徵意義。帝王御書與其他遊賞、觴詠的詩篇並置，使園林空間意涵、記憶的延伸、繼承、開展向度更為廣闊，成為一種地景記憶的典範。

本文 103.02.05 收稿，103.08.10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關鍵詞：滄浪亭、御碑、乾隆、康熙、吳存禮、政教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Space: The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Imperial Stele of Chang-Lang Ting in Qing Dynasty

Ye Ruei-chen^{*}

Abstract

After Su shun-qin build Chang-Lang Ting(Great Wave Pavilion), Chang-Lang Ting has been reconstructed and ruined repeatedly. In Qing Dynasty, Song-luo reconstructed Chang-Lang Ting in the name of local officials. Song-luo restored the memories and scenes of Su shun-qin and converted the spatial property. Chang-Lang Ting were turned into a public garden from a private garden. After Song-luo, Wu cun-li and An-ning set imperial stele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at the pavilion. After that, imperial stele became a conspicuous scenic spots. Imperial steles gave Chang-Lang Ting new meanings by interpretation of local officials. Therefore, the function

^{*}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and social intercourse of literati became the double main theme of spatial meanings. The imperial steles and works of literature about social intercourse of literati let the meaning and historical memory of Chang-Lang Ting expand. Finally, the imperial stele became a model of the landscape memory of Chang-Lang Ting.

Keywords: Chang-Lang Ting, imperial stele, Qian-long, Kang-xi, Wu cun-li,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政教空間的形成

——清代滄浪亭御碑的意義與詮釋

葉 叡 宸

一、前言

宋代蘇舜欽因進奏院一案，遭貶為民，¹於蘇州城中五代時孫承祐池館舊址上重建滄浪亭，作為個人仕宦淹蹇時的退藏之所。他將亭子取名「滄浪」，源自熟知的文化意涵。《孟子·離婁》紀錄孺子之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²孔子因發「榮辱自取」之感；該詞同樣見於《楚辭》中漁父的鼓枻詠唱，代表一種「隨順處逆」且「不凝滯於物」³的人生境界與生命智慧。以「滄浪」為園命名，是蘇舜欽試圖在儒、道之間，求取生命的解脫；亦是對自我人生能夠隨順處逆的慰勉。他以亭名意義籠括整座

¹ 蘇舜欽因進奏院案遭王拱辰教唆魚周詢誣陷一事，詳見《宋史·文苑傳》：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者十餘人。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3079。

²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98。

³ 見〈漁父〉，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出版社，1967年），卷7，頁2a-2b，總頁297-298。

園林空間，並期許「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⁴可見滄浪亭實代表蘇舜欽自我生命希冀安居止息、整復心情的一處棲逸空間。

其後，滄浪亭數經易主，至元、明二代，原本蘇舜欽建構出的園林形象漸次模糊，這片園林空間以僧寺的面貌呈現了數百年之久，⁵宗教的空間性質已然印刻於一般文士內心、記憶之中。嘉靖二十五年（1546），大雲庵寺僧釋文瑛重建滄浪亭，並託歸有光作記。僧人的重建與文人的書寫，架起舜欽之名與滄浪亭的連結。文瑛認取蘇舜欽作為園主的典範，並有意彰顯園林代表的文士精神。⁶然而釋文瑛重建後的滄浪亭，雖有名稱與舊主的結合，但在其他遊人眼中，仍是以宗教性的空間看待之，⁷當初那個具有蘇舜欽文士生命特質的滄浪亭面貌依然稀微晦明。⁸

⁴ 宋·蘇舜欽：〈滄浪亭記〉，沈文倬校點：《蘇舜欽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58。

⁵ 元延祐年間（1314-1320），僧宗敬建妙隱庵、至正年間（1341-1368），僧慶善建大雲庵，一名結草庵。

⁶ 明·歸有光〈滄浪亭記〉：「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南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歸有光在歷任滄浪亭園主中，獨獨標揚舜欽之名，認為舜欽之人格精神能使滄浪亭流傳千載。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15，頁387-388。

⁷ 如文徵明作〈大雲菴記〉，以「吾吳故多佛刹」起筆，一路追索佛寺的空間歷史變化，在滄浪亭舊址上認取的是宗教性的空間。（清）梁章鉅：《滄浪亭志》，卷2，頁7a-8a；或如吳寬〈草菴記遊詩並引〉：「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為修禪讀書之地。」認取的是滄浪亭為宗教清幽、適宜修行的景象，皆不見滄浪亭和蘇舜欽的園林記憶。見清·梁章鉅：《滄浪亭志》，卷2，頁6b。收錄於《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總頁58-60。

⁸ 曹淑娟先生提到：「文瑛雖然重修滄浪亭，但非整體環境性質的改變，簡單的沿用舊名，倩人作記，書寫所發揮的作用仍然有限，南禪寺、大雲庵的宗教性依然主導著空間意義的詮釋。」，〈明清滄浪亭古園重修與歷史文化記憶〉，頁313。

入清以後，宋荦著手重建滄浪亭，接續著釋文瑛，牽起了蘇舜欽與滄浪亭的歷史記憶。宋荦重修後的滄浪亭，蘇舜欽與亭子的記憶斷片雖被拾起，⁹但滄浪亭的空間性質亦已轉化，因著官修園林的緣故而使園林空間走向公共與開放。

宋荦重建滄浪亭後的二十餘年，滄浪亭又暫時隱入時間洪流的寂靜中。康熙四十六年（1707），玄燁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南巡時，賜給當時江蘇巡撫吳存禮一詩、一聯。詩云：「曾記臨吳十二年，文風人傑并堪傳。予懷常念窮黎困，勉爾勤箴官吏賢。」；¹⁰另一幅對聯則曰：「膏雨足時農戶喜，縣花明處長官清。」¹¹吳存禮欲鐫刻立碑以宣揚聖上恩寵，經與地方父老商議後，選定滄浪亭作為設置石碑的地點。於是倩工刻石，將此一詩、一聯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刻石於園林西偏，並建造了現今可見之「御書碑亭」。¹²

除康熙御書外，其後乾隆皇帝六次巡訪江南時，遊跡亦曾至滄浪亭。¹³當時，乾隆皇帝帶著遊賞心情駐蹕其中，並留下相關詩作五首：〈滄浪亭〉、〈戲題滄浪亭〉、〈題滄浪亭〉、〈游滄浪亭〉、〈寄題南園〉。¹⁴另外，乾隆十二年（1747），江南地方以蘇、松二處為核心的區域發生嚴重水患，以崇明島為主

⁹ 有關滄浪亭在明、清的重建以及對歷史、文化記憶與人物典範之認取，可參曹淑娟先生：〈明清滄浪亭古園重修與歷史文化記憶〉一文，收錄於《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學生書局，2011年），頁297-329。

¹⁰ 《滄浪亭志》，卷首，頁1a。

¹¹ 《滄浪亭志》，卷首，頁1b。

¹² 蔣瀚澄：《滄浪亭新志》，卷4，頁8b-9a，《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總頁96-97。

¹³ 按《南巡盛典》紀錄，乾隆造訪滄浪亭並留下詩作的時間為：卷12〈戲題滄浪亭〉作於乾隆三十年（1765）、卷16〈題滄浪亭〉作於四十五年（1780）、卷21〈游滄浪亭〉作於四十九年（1784）。清·高晉等：《欽定南巡盛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8、659冊。

¹⁴ 《滄浪亭志》，卷首，頁3b-頁4a。

的數個州縣「漂室廬溺，老幼不可勝計」。¹⁵乾隆接獲地方大員通報災情慘重後，除了進行救治外，亦仿擬杜甫〈同谷七歌〉創作〈江南潮災歎〉示己對庶民哀憫之心跡。作品一共八首，乾隆創作之後，交由當時總理其事的江蘇巡撫安寧頒佈。安寧將此首詩歌勒石銘刻，亦擇定滄浪亭作為宣告之處所。¹⁶

康熙御書一詩一聯以及乾隆巡訪江南所作五首詩，都是兩位帝王要求地方官員必須恪守不怠、循名責實的期待。而乾隆所作的〈江南潮災歎〉表達帝王主動關懷民瘼的仁愛精神，並有意將自我心跡宣揚、昭告。帝王書寫在地方撫臣的安排下，以石刻的碑文型態進入了滄浪亭，作為一處醒目的新景點存在著。

回顧亭子的歷史，當年蘇舜欽以罪臣身分建立滄浪亭，園林是其排遣生命無奈的私人性空間；此後園林或荒廢，或為僧寺浮圖，或為遊觀觴詠、雅集良會之所，一連串的流變與重修，皆是園林空間意義的轉化。曹淑娟先生指出在這些園林重修過程中：「蘇舜欽與滄浪亭，在被記憶的過程中，作為一個意涵鬆動的符號系統，意義的邊界可以挪移調整、縮小或擴大。」¹⁷並舉吳存禮建御書碑亭、梁章鉅與陶澍五百名賢祠為例，認為官員們在重修過程中，為園林添加了新元素：「這些新地景的增設都與蘇舜欽當年買地構亭，追尋自勝之道的原始規劃互不相干，甚至於與蘇舜欽在政治場域遭受否定的際遇相背反。」¹⁸指出「御書碑亭、帝王訓誡，以石碑、文字、語言的各種形式駐留在滄浪亭的空間中，成為最醒目的標誌，占有了所有眺望滄浪亭的目光。」¹⁹認為御碑及相關

¹⁵ 《滄浪亭志》，卷首，頁 4b。

¹⁶ 據梁章鉅《滄浪亭志》與蔣瀚澄《滄浪亭新志》二書記載，滄浪亭中帝王御書有二：其一為康熙御製詩，今見於園內假山（近山林）西側的康熙御詩碑亭（御碑亭）、另一為東側的乾隆御碑亭（一名閑吟亭）。詳細的滄浪亭園林景點方位布局圖參考李宗維編著：《城市裡的山水情懷：蘇州園林》（臺北：旗林文化，2006 年），頁 10。

¹⁷ 曹淑娟先生：〈明清滄浪亭古園重修與歷史文化記憶〉，《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學生書局，2011 年），頁 326。

¹⁸ 同前註。

¹⁹ 同註 17，頁 326-327。

書寫改變了蘇舜欽滄浪亭的文化歷史意義，也使歷史文化記憶繼續延伸、擴展。而本文在此基礎上，意欲進一步探究御碑與園林空間的關係，並說明官員設立御碑後，如何影響滄浪亭的空間意義。此中，有幾個幾個議題值得討論：御碑的設立與滄浪亭重修後的園林性質有何關聯？是否賦予滄浪亭新的空間意義？帝王書寫的內容與動機何在？地方官員設立御碑的用意為何？官員又對帝王書寫進行了何種詮釋？並且，御碑的設立是否影響園林存續？透過上述議題的展開，以期能夠解釋御碑對滄浪亭空間意義的交互關係，並探看地方官設立御碑後，如何使滄浪亭從蘇舜欽折衷儒道力求棲隱療傷的空間，進而轉變為一開放且具儒家入世精神的「政教空間」。

有關園林的「政教意義」，可從兩面向來看，第一乃是指園林具有的官方教化功能；其二，主導園林營造的地方官心態。如侯迺慧先生提到：「宋代的文人刻意地在詩文中彰顯郡圃正面的政治意涵。首先強調郡圃是政成俗阜之後的產物，所以是優良政績的表徵。其次強調地方政府修建郡圃不是為了個人的逸樂，而是與民同樂的王政之實踐，同時還能負起禮待賢士的使命。復次，在前兩點的基礎之上又以郡圃的興建是地方官遺愛於民的表現，所以郡圃中的建築物作為紀念賢官的所在。這是政績上面的意涵。」²⁰可見從宋代開始，地方官員修建園林，乃屬個人政績的一部分，象徵個人政治理想之實踐。而營建此類園林的企圖，除是官員顯揚自身，也是檢驗自我理政能力的實踐度，故又符合傳統儒家士大夫「外王」精神的開展與追求。

相較於園林普遍具有的遊觀功能，其政治教化的功能相對特殊，因此也往往使園林空間具有更多元的意義和豐富圖景。滄浪亭在設立御碑後，便開始負擔地方的政教功能，如從乾隆年間始，便有諸多教化活動假滄浪亭舉行；²¹並且，

²⁰ 侯迺慧先生：《宋代園林及其文化生活》（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頁180。

²¹ 如乾隆年間巡撫徐士林為節約蘇吳地區奢侈民風，於園中舉行「五簋宴」告諭地方士紳；道光年間滄浪亭有大規模「放生會」，有意勸化奢侈鋪張的蘇吳民風。

道光、同治時，重修官員更在滄浪亭中設立具有教化意義的景觀（五百名賢祠、明道堂），促使滄浪亭成為地方政教文化的精神象徵。而從重修者的詩文中，可知官員乃是將滄浪亭視為眾民同樂的處所，也是個人政績的表徵。在重修官員整建滄浪亭的認知中，亦是將之視為重要的地方政教場所，使滄浪亭類同於宋代的「郡圃」。這和當年蘇舜欽築園棲逸療傷的空間意義，或是純屬休閒娛樂的園林空間，皆形成相互對比的有趣現象。

透過對政教意義之解讀，讓我們在看待園林文化時，能對其空間意義有更多維度的思考，而不僅是侷限於休閒娛樂或是應酬交際的討論範疇。御碑的設立，即象徵滄浪亭背負政教意義的發端，也是其產生多元空間意義、豐富圖景的開始。故本文著眼於「御碑和清代滄浪亭空間政教意義的內涵與發展過程」，其餘有關園林物質文化、遊觀活動的內容，非本文討論焦點。²²主要仍希望透過御碑內容，以及人物對御碑的意義解讀與詮釋，討論御碑如何使滄浪亭空間開始具有政教意義；進而能理解滄浪亭從蘇舜欽「棲隱幽居」到清代官員「入世教化」之空間意義轉化。

二、御碑設立與滄浪亭地理位置、空間公／私性質的交互關係

康熙年間，江蘇巡撫吳存禮獲得御賜詩、聯各一，自言「因不敢自私，欲鐫諸石以宣揚皇上德意，為三吳士林光寵。」²³則吳存禮立碑除了歌功頌德，以

²² 有關本文提出的議題與各項觀點，承蒙曹淑娟先生以及審查過程中諸位評審委員先生的寶貴意見，包括：須從歷史空間、政教空間、品味空間的交互作用進行滄浪亭空間意義的討論；對乾隆〈江南潮災歎〉的詮釋應具備歷史高度，給予本文極大的啟發與反思，謹志於此，以銘謝忱。然針對上述問題，因受限於篇幅，不能逐一詳細討論；有關清代滄浪亭重修後空間多元意義的詮釋和疊合，筆者另著有《儒家園林的建構——清代滄浪亭的重修與空間意義建構》學位論文，拙作對上述一系列相關議題有更為豐富詳細的詮釋及討論。

²³ 《滄浪亭志》，卷3，頁10b。

及宣傳皇恩浩蕩，更有間接顯揚自己的意圖。從統治者的角度而言，帝王刻石、立碑的地點，除被認為是具有自然靈力的處所，同時亦是統治者欲關注的空間，意即是朝廷政治力量的「重點觀察區」。負責將御書鐫刻立碑的吳存禮、安寧，則是「為帝王傳話」的代言人。因此，身為地方官員的他，將御書碑刻引入園林，除是將「聖意」與民共享、宣播帝王榮寵及勉勵，亦是對權力中心的認取、擁戴，甚可視為帝王教諭的宣傳者；乾隆時，安寧應也是因襲吳存禮之先例，故擇定於滄浪亭立碑，將乾隆對受災百姓的慰告心跡公諸傳布。無論是宣告皇恩德澤或帝王對地方的關切、教諭，主政者在立碑之時，應會就該處的空間性質進行以下考量：其一，從立碑地點的性質而言，當屬地方政教的核心場域；其二，從宣導傳播的效果來說，眾多人口匯集的空間，有助於訊息的傳布與流播。而對此二者，我們可分別從滄浪亭所在地理位置以及園林本身的空間性質來思考官員選擇立碑滄浪亭的考量。

首先，無論從政治或經濟的角度而言，蘇州實為江南地區的核心地域，故其民生風俗、社會風氣尤受當時統治者關注。據巫仁恕先生指出，明清時期蘇州城內西南恰好是官署衙門的聚集地帶，也是縉紳士大夫的群聚之所。²⁴而滄浪亭座落的位置恰與郡學、府署、縣署比鄰，²⁵於此設立御碑便能詔告大小官員，達到約束地方官員與知識分子的成效。

其次，清初重修後的滄浪亭，成為城內百姓樂遊之處，而上述官員設立御碑的教化效果方能收其成效。因此，公共化的園林空間，也是官員可能考慮於滄浪亭設碑的原因。巫仁恕先生曾以蘇州城作為一處觀察的空間，進行明清遊觀文化的詮釋，其中便指出園林遊觀活動為當時盛行之風氣。而這樣的盛況無

²⁴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頁156。滄浪亭座落方位圖示詳參該書頁189。

²⁵ 因此如蔣復煊〈遊滄浪亭記〉：「且滄浪距使院僅一里，無筭鑰之禁，視虎阜較近，心猶慕之。」、李必恒〈滄浪亭用歐陽公韻〉：「尋幽弔古曰不厭，勝蹟況在牙門邊」，可知滄浪亭與當時政府公署相隔不遠。

論是私家園林或官修園林，都呈現出一種「公共化」的開放性，²⁶其中，特別指出滄浪亭和拙政園、獅子林與依園，皆為當時吳人喜遊之去處，²⁷可見滄浪亭在清代和其他名園皆已屬具備眾民來遊的公共化特質。

宋瑩在〈重修滄浪亭記〉提及，未經整修前的滄浪亭「巨石頽仆，小山藪翳於荒煙蔓草間，人跡罕至。」²⁸而他「亟謀修復，構亭於山之巔，得文衡山隸書『滄浪亭』三字，揭諸楣，復舊觀」，²⁹並取蘇舜欽〈滄浪亭記〉中的「自勝之道」一語，築「自勝軒」；並因舜欽詩名於園中三面環水處之東北角構築「觀魚處」；另建有「步碕」與主祀舜欽木主之「蘇公祠」，³⁰可見宋瑩重修後的園林空間景觀，皆是向蘇舜欽滄浪亭的歷史文化精神核心進行認取。重整後的園林，景觀幽美、適宜遊賞。據宋瑩自言，園林作為一處與外界區隔的空間：「事物雜投於吾前，憧然莫辨，去而休乎清泠之域，寥廓之表，則耳目若益而曠，志氣若益而清明。然後事至而能應物，觸而不亂。」³¹宋瑩在公務繁忙之中，優游園林，可以修行、沉澱心靈。而園林作為一處陶養心靈的處所，其中的活動者，不只宋瑩個人「暇輒往遊，杖履獨來」，³²他更以地方官員、重修者的身分，主持園林內部的聚會。其子宋至亦描繪其父與賓客往來遊賞、陶然園中：「為政心閒脫官樣，招攜上客同遨遊。」³³宋瑩有意識地以這些雅集活動為滄浪亭進行歌詠、唱和，並集其相關篇章編成《滄浪小志》一書。《滄浪小志》載錄大

²⁶ 巫仁恕先生將此一園林遊觀風氣放入城市消費文化中進行討論，從而揭示蘇州城園林由私家走向公共的現象。參氏著：《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頁 193-231。

²⁷ 同註 26，頁 173。

²⁸ 清·宋瑩：《滄浪小志》（江蘇：江蘇書局，1884 年），卷上，頁 1a。

²⁹ 同前註。

³⁰ 《滄浪小志》，卷上，頁 1b。

³¹ 《滄浪小志》，卷下，頁 2a。

³² 〈重修滄浪亭記〉，《滄浪小志》，卷下，頁 1b。

³³ 〈滄浪亭〉，《滄浪小志》，卷下，頁 24b。

量以「滄浪亭」為題的唱和作品，成員從官員至布衣、僧人皆有，顯示當時遊園者身分的多元性。³⁴而除了名士的歡會，朱彝尊有詩云：「游觀民胥悅，豈弟神所勞。」³⁵顧圖河云：「春臺熙熙民共樂，度橋穿徑聯背肩。」³⁶劉石齡云：「與民偕樂公至意，倚樹倘容吾醉眠。」³⁷潘耒云：「既政通而人和，時求舊以訪古。表前修之墜，言存哲士之遺矩，陟層岡而賞心。」³⁸相對於宋瑩與諸文士的士人雅集，這些詩句中刻劃出宋瑩為官清廉、撫吳有成而人民熙樂攘往、相招偕遊的園林盛況。或如潘耒〈滄浪亭賦〉所云：「抑且肩鐻不施、籓籬不設，公諸士民，餐芳沐潔。懷賢者薦夫蘋蘩，訪古者誦夫碑碣。牛鐸得應黃鐘，巴歌許賡白雪。」³⁹則原本雅潔高士的居所，經宋瑩重修後，儼然成為官民同樂的熙樂場所。此外宋瑩〈蘇子美文集序〉云：

予宦遊吳門，得宋蘇子美滄浪亭遺址於荒煙蔓草中，稍稍為之起廢墜，葺垣屋，數年以來，亭之樹石，若歲益而古；嘉花名卉，若月益而娟妍；而吳之人雅好事，春秋佳日，遊屐麇集，遂擅郡中名勝。⁴⁰

可見在宋瑩悉心經營下，滄浪亭景致彷彿恢復昔時樣貌，頗具歷史風韻。而每逢佳日，遊人紛沓而至，遂為蘇城名勝。滄浪亭這種公共化的狀態，除了園林性質的改變；也因著宋瑩良好的理政能力，大量的遊人進入滄浪亭，使「官民

³⁴ 據《滄浪小志》所載作者共 26 人，包括陳廷敬、王士禎、朱彝尊、范承勳、邵長蘅、顧貞觀、朱載震、顧圖河、梅庚、洪昇、殷鑒慶等。當時顧貞觀、朱彝尊等人為朝廷官員；而宋瑩〈盤山青溝拙道人遠道見訪留住滄浪亭二首〉、吳士玉〈春日遊滄浪亭觀牡丹聽澄照上人琴〉，可見僧道亦為園林訪客。

³⁵ 〈滄浪亭為牧仲中丞作〉，《滄浪小志》，卷下，頁 10b。

³⁶ 〈滄浪亭用歐陽公韻〉，《滄浪小志》，卷下，頁 14a。

³⁷ 〈滄浪亭用歐陽公韻〉，《滄浪小志》，卷下，頁 20a。

³⁸ 〈滄浪亭賦〉，《滄浪小志》，卷下，頁 26b。

³⁹ 清·潘耒：〈滄浪亭賦〉，《滄浪小志》，卷下，頁 27a。

⁴⁰ 清·宋瑩：〈宋蘇子美文集序〉，沈文倬校點：《蘇舜欽集》，頁 252。

同樂」成為可能。因此當時的園林空間中，不僅名士齊聚，更是「野老接席，鷗鳥不驚」，⁴¹地方民眾和官員同為滄浪亭中的遊人，滄浪亭公共開放的特性在宋葦重修後更為顯著。

相對於蘇舜欽是一遭黜退為民的失意官員，宋葦則是以朝廷地方命官身分重修滄浪亭。宋葦重修後的滄浪亭，舜欽與亭子的記憶斷片雖被拾起，但滄浪亭的空間性質亦已轉化。對宋葦而言，滄浪亭除了能使自我心性於其中涵容優游，又可作為友朋聚會以及與民同樂的空間。這與百年前蘇舜欽建滄浪亭「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⁴²意在親近自然、趨避複雜人事而作為隱逸、療傷的私人居所，已迥然迥異。此時的滄浪亭，不僅是文士們交相唱和、吟詠雅集的最佳場所，亦是諸民來遊的安樂之場。

大抵而言宋葦重修後，滄浪亭的園林空間雖能予人性靈上之陶然愉悅，但已不只是專屬園主個人的私領域。走向公共、開放性的滄浪亭，有了與更多人接觸的機會。也因此，道光年間巡撫張樹聲追憶當時園林景況：「國朝康熙年間，宋中丞葦而復之，為觴咏之所，風流文采，藉甚於時。」⁴³地方士民能夠上下共賞交歡同樂、友朋可以往來其中寓目寫心。而也正是因園林空間性質經此轉化後，在吳存禮之時，我們方能看到滄浪亭中士、民遊觀的圖象：

謹擇城南勝地，舊所傳滄浪亭者，閒曠清靚，嘉樹茂密，清流環繞，春秋佳日，都人士遊觀之所。⁴⁴

園林空間的公共性，與其本身的觀覽價值相關聯。吳存禮描繪當時滄浪亭的整體景觀是「高曠軒敞，心舒目開，遠岫浮青，曲池洩碧，左右老樹數株參差交

⁴¹ 〈重修滄浪亭記〉，《滄浪小志》，卷下，頁1b。

⁴² 《蘇舜欽集》，頁158。

⁴³ 清·張樹聲：〈重修滄浪亭記〉，《滄浪亭新志》，卷2，頁4b。

⁴⁴ 《滄浪亭志》，卷首，頁3a。

映，四時蒼翠不凋，誠為吳中靈異之境，曠千百年而有待者也。」⁴⁵身處滄浪亭園林中，視野開闊，景觀秀美而能感清幽閑靜。因此滄浪亭方是每逢良辰節慶，都會民眾的「遊觀之所」。

根據乾隆御書詩句云：「云備來往官，於此為送迎」，⁴⁶則可見當時帝王也將滄浪亭的空間性質視作一「送迎之所」，專門供給政府人員公務接待使用。官員重修後的滄浪亭除了是一般民眾遊玩觀賞的去處，更是大小官員居處活動場所。是故，在宋軫重修並賦予滄浪亭公共、開放性質的基礎上，使吳存禮得以選定滄浪亭作為一傳遞訊息、設立御碑之所。如此，無論是帝王的告諭抑或官方教令，皆可在遊人絡繹往來、大小官員憩息時，發揮極佳的公告效能。

滄浪亭中的御書刻石，作為豐饒蘇吳都會景象的見證與呼應，可謂是清朝政權在經營江南地區數十年後，有意樹立的一個官方性告諭——吳存禮身為當時的地方官，為御書刻石立碑，除有意彰顯帝王恩寵外，也是他身為地方官員必須負起的政教職責。而吳存禮於園中立碑刻石，乃至其後安寧為乾隆〈江南潮災歎〉刻石立碑，這一脈相承的過程中，御書成為全新的景點。因有御碑的設置，滄浪亭作為一處公共園林空間，更具有園林帝王告諭、宣示的官方政教意涵。

三、滄浪亭御碑帝王書寫的內容與心態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見因御碑進駐和滄浪亭地理位置、空間公/私性質的交互關係。繼而我們進一步欲探究：滄浪亭中的御書碑刻，代表著帝王的心跡，

⁴⁵ 〈重修滄浪亭記〉，《滄浪亭志》，卷3，頁11a。

⁴⁶ 《滄浪亭志》，卷首，頁4a。

則帝王們的書寫又具有甚麼樣的期待與目的？使之不同於一般帝王筆墨之娛，而是具有政教力量之特質。

根據御碑上康熙、乾隆的書寫內容，其主旨可分為兩類：一為對官員的褒獎與勗美、二是帝王關懷民瘼的襟抱。

（一）、褒獎與勗美並存的官箴

先觀康熙皇帝當年賜予巡撫吳存禮的御詩：

曾記臨吳十二年，文風人傑並堪傳。予懷常念窮黎困，勉爾勤箴官吏賢。

47

以及對聯一副：

膏雨足時農戶喜，縣花明處長官清。⁴⁸

根據吳存禮〈重修滄浪亭記〉云：

己亥夏，特蒙聖恩，賜以御製詩一章，軫念窮黎，勉循厥職。蓋歷數十年休養生息之久，民物悉已安阜，而尤惓惓於江南。⁴⁹

康熙賜予吳存禮的一詩一聯，是帝王對臣子的勉勵、稱許。從詩作中可見到勤政帝王關切地方的心理。聖上心中常念黔首黎民，同時亦不忘提醒地方官吏，要能夠賢明慈愛、勤於政教。是而百姓既能在風調雨順當中獲得基本生活要件的滿足，又能因地方大小官員「清廉」的吏治，使一地重獲天時、地利、人和，自然形成物阜民豐、人民安居樂業之狀態。

⁴⁷ 《滄浪亭志》，卷首，頁 1a。

⁴⁸ 同註 47，頁 1b。

⁴⁹ 《滄浪亭志》，卷 3，頁 10b。

同樣的，帝王期待地方吏治清明的理念，也在乾隆皇帝身上有所延續。乾隆於南巡時造訪滄浪亭，相對康熙留下更多詩作，作品意涵也更豐富。其一是帝王的遊園的隨筆之娛，有調侃求學士子之意：如乾隆〈戲題滄浪亭〉：「假山真水傍城闌，結構誠云清絕塵。一帶隔溪列公廨，不知誰是濯纓人。」⁵⁰其二為歌詠滄浪亭園林形勢、景象、人物的追憶之語：如〈題滄浪亭〉：「蘇城盤門側，向有滄浪亭。翠邏雖假山，而其水誠清。結構樸而雅，頗具豁壑情。」⁵¹〈滄浪亭〉「濯纓傲志寄歌詩，怪石珍花儘足奇。自是士信於知己，不妨激語荅韓維。」⁵²〈寄題南園〉：「南園聞說貽王令，林色泉聲鎮若新。待漏院文曾熟讀，豈伊狂歡醉鄉人。」⁵³另外則是帝王對地方官員的勉勵、期待，如〈題滄浪亭〉云：「即今興復別，六計廉胥程。治官應此亟，維廉清乃成。寄語遊斯者，勉實善副名。」⁵⁴〈游滄浪亭〉：「滄浪亭是延賓所，點綴湖山其水清。大法小廉應視此，憩於此者合循名。」⁵⁵屏除那些隨意的遊戲之作，一如康熙賜給吳存禮的御書主旨，乾隆的部分作品同樣透露出帝王對官員必須恪守不怠、循名責實的要求，以及愛民如己的諄諄訓勉。

因此，上述詩句除歌詠景色、人物以外，還有最高統治者對於次級統治者的告諭，我們可見到帝王期待藉由地方吏治的清明，貫徹自我政治理想的祈願。

（二）、乾隆〈江南潮災歎〉之帝王形象塑造

上述帝王隨興而發的詩作，大多屬於精神上的期待與勉勵。而乾隆皇帝八首〈江南潮災歎〉，則讓我們從一次的重大水患事件中，實際看到領導者處理

⁵⁰ 《滄浪亭志》，卷首，頁 3b。

⁵¹ 《滄浪亭志》，卷首，頁 4a。

⁵² 同前註。

⁵³ 《滄浪亭志》，卷首，頁 4b。

⁵⁴ 《滄浪亭志》，卷首，頁 4a。

⁵⁵ 同前註。

政務的能力與心態。乾隆這首〈江南潮災歎〉，體制仿擬杜甫〈同谷七歌〉，表達自我對水患受難百姓的哀嘆。⁵⁶〈江南潮災歎〉前有小序，可知當時的創作背景、動機：

乾隆丁卯七月望，蘇松罹海潮之患。崇明島南匯為最重，連延數州縣，漂室廬、溺老幼，不可勝計。督撫奏報賑救之策，亦既殫力竭心。而下詔蠲稅截漕，更復多方籌畫。然遙顧災黎，憾憾不能去懷。夫六幕不調，洪波不警，伊誰之咎歟？爰效杜甫同谷作歌之體，為〈江南潮災歎〉，用示督撫諸臣，兼以自訟云爾。⁵⁷

又根據現存其他有關資料、紀錄可見當時災情慘重：

今歲蘇松等屬沿海地方猝被風潮，朕已屢降御旨，緩徵加賑，并截留漕米，豫籌接濟，復命高斌查辦。今覽安寧所奏坍塌房屋十萬餘間，淹斃人民一萬二千餘口，實非尋常災祲可比，大抵雍正十年潮災相仿。朕心覺忱惕，更為憫側。⁵⁸

乾隆十二年（丁卯），江南地區發生大規模潮災，海水倒灌，廣陌平原上的屋舍、田地被無情洪水吞噬，重創江南地區民生經濟。⁵⁹災情傳出後，乾隆立即頒

⁵⁶ 曹淑娟先生曾於「台大中文系第 336 次學術討論會」上宣讀〈〈同谷七歌〉系列的重層世界及其轉化〉一文，環繞杜甫〈同谷七歌〉系列之詩歌發展史、接受史的議題展開，並對乾隆〈江南潮災歎〉的創作背景、詩作內容及精神進行剖析，對本文在此一議題的發掘與討論上有極大啟示，特明於此，以誌謝忱。

⁵⁷ 《滄浪亭志》，卷首，頁 4b。

⁵⁸ 華文書局輯：《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年），卷 298，乾隆十二年丁卯九月，頁 2b-3a，總頁 4317-4318。

⁵⁹ 同上註：「本年七月十四日，蘇松等處猝被風潮，而崇明一邑受災為尤重。朕前據安寧奏報，深為憫側，即降旨諭，令加意撫恤，并截留漕米，以備接濟。又令大學士高斌留南查辦，月餘以來，憂心未嘗稍釋。今續據安寧查報，崇明一邑，坍塌房屋，漂沒人民甚多。」，頁 11a-11b，總頁 4322。

布各項補償方案，責成地方官員處理。各種賑濟災民的政策，諸如「蠲稅截漕」、「緩徵加賑，並截留漕米，豫籌接濟」除了免除受災戶的當年度稅金，更調度官銀，供給人民借貸進行災後重建。⁶⁰伴隨著救災與賑濟的步伐，好詩且力學作詩的乾隆，仿杜甫〈同谷七歌〉搦筆為〈江南潮災歎〉一篇，對此次災情及政府後續處理，訴說感懷：

江南古來稱澤國，十歲九滯患不息。集議為謀疏浚方，補救惟應盡人力。
潮災數十歲一遇，不先不後於茲值。嗚呼一歌兮歌始辭，遙遙南望興嗟
咨。（其一）

有奏有奏自南來，七月望日潮為災。天網淖淖洪濤湧，氣厭百川為倒迴。
縱有禹也應束手，胥為魚矣惟增哀。嗚呼二歌兮歌再陳。披奏到今常感
辛。（其二）

蘇松郡邑濱大海，民乏那堪遇凋瘵。一夕風濤多沒淪，南雁崇明首稱最。
去歲淮揚河患重，胡乃災傷一時會，嗚呼三歌兮歌放言，波臣何處為招
魂。（其三）

⁶⁰ 詳細的救災政策如《大清會典則例》十二年戶部所載：「又題準江南乾隆十二年七月颶風驟雨，潮水衝決濱臨江海之常熟等十七州縣，並蘇州太倉鎮海金山四衛。民屯沙洲田禾花豆衝沒。又夏秋雨澤愆期，上元等十二縣并揚州儀徵鎮江三衛被旱災田地丁銀米按分數蠲免，蠲剩銀米按被災輕重分年帶徵。十三年新賦緩至秋成後啓徵，各年舊欠地丁銀米緩至來年麥熟徵輸。如有勘不成災，收成歉薄，應徵本年地丁銀米並借欠籽種，亦緩至來年麥熟徵收。又災田漕糧漕項所有被災較重之上海、鎮洋、寶山、常熟、太倉等七州縣，並蘇州、太倉、鎮海、金山四衛災田，按分數蠲免銀米。南匯、嘉定、上元等九縣，所有本年災田漕糧均緩至明冬帶辦，漕項銀與地丁一例緩徵。」，見乾隆十二年敕撰：《大清會典則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1冊，卷55，頁57b-58a，總頁740-741。

彼時聞道多東風，赤龍奮怒長蛟洪。鼉鼉蝮蝮借勢雄，磨牙礪爪思腹充。
萬間茅屋如捲蓬，須臾化作馮夷宮。嗚呼四歌兮歌四疊，傷哉吾民命輕
葉。（其四）

民命輕於葉可傷，昏夜走避無向方。巨浪連山風更鼓，淙淙汨汨雨屑涼。
屋廬漂蕩全家歿，其稍幸者乃有孤兒嫠婦哭其傍。嗚呼五歌兮歌未闌，
不必眼見涕沅瀾。（其五）

死者已矣生堪憫，驚魂裁定沉酸引。強奪弱餐祇為飢，母牽子售非由忍。
此時破屋已無依，轉眼冬來更寒窘。嗚呼六歌兮歌未已，不為空言徒罪
己。（其六）

誰云救災無善策，盡一分心一分益。截漕蠲稅蠲示概，調劑詳籌牧臣職。
倉儲庫平莫吝慳，墨吏豪胥戒侵索。嗚呼七歌兮歌稍終，吾言有盡心何
窮？（其七）⁶¹

杜甫的〈同谷七歌〉，乃是戰火肆虐的天寶年間，身為一家之長的杜甫，帶領家人躲避戰亂，卻困居同谷縣的實際艱苦經驗。杜甫以自我真實的體驗傾訴沉重的血淚悲歌。詩中描寫杜甫與家人親族，在戰亂中百般困乏的生活狀況。杜甫既無力改變現狀，又想起自身長久落拓，不由得產生老大徒傷悲之感。在天地漂泊，客舍異鄉的處境下，〈同谷七歌〉是杜甫貧苦無以自存的傾訴，同時也反照出混亂時代的艱苦情狀。對比杜甫從人民角度敘說自我的悲哀，乾隆的擬作則是從統治者的角度看待生民疾苦，兩者之間有差異。首先，兩者基本的主題不同，一說戰亂兵燹，一云天災水患；其二，杜甫本身即是詩作主角，〈同谷七歌〉詩中的情緒乃是強烈的自體自感；作為一個帝王，遙居帝京的乾隆實際上並未親臨南方災區，大凡詩中描寫水患「萬間茅屋如捲蓬，須臾化作馮夷宮」的肆虐場景，泰半來自乾隆閱畢奏章後的想像遙顧。兩者對於苦難情景感

⁶¹ 《滄浪亭志》，卷首，頁 5a-6b。

受的真實性，程度上確有不同。其三，面對兵災人禍，杜甫展現出一股無可奈何的逆來順受；乾隆貴為天子，擁有分配資源的權力能救治眼前災難，因此，乾隆殷殷呼告的對象，反而是一種帝王的對天地的呼求、詔告宣示，而非杜甫的無奈呻吟、悲鬱。

然而一位有力量應變、處置災害的帝王，以及那些水患受災人民，彼此之間無論是地位或處境皆是天壤之別，乾隆〈江南潮災歎〉對災難發出的感嘆與言說畢竟非親體親感。若乾隆的〈江南潮災歎〉只是帝王單方面的傾訴悲感，不免流於無病呻吟，則帝王與人民之間終有隔閡。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透過詩作來觀看，乾隆的自我言說傳達了何種意義、產生了何種效果？

綜觀〈江南潮災歎〉的主旨，從一歌至七歌，乾隆依時間序列描述水患始末。「遙遙南望興嗟咨」（其一）乾隆同時藉此抒發接獲災報後內心的感傷。然而，若詩歌的敘述只純粹停留於帝王表達獲報後的悲感，則做為一個旁觀者與權力的掌握者，恐怕仍無法使人感到自己「苦民所苦」的深刻感受。因此從第二首開始，乾隆嘗試以「想像」的手法進行書寫，他遙想水患強而兇猛：「彼時聞道多東風，赤龍奮怒長蛟洪。鼉鼉螭螭借勢雄，磨牙礪爪思腹充」（其四）怒濤加上狂風，以蛟龍、鼉鼉狀擬水勢之威，造成「萬間茅屋如捲蓬，須臾化作馮夷宮」（其四）、「屋廬漂蕩全家歿」（其五）民眾因水患流離失所，整個災區有如人間煉獄。而乾隆不只停留在災難場景的描繪，又透過「示現」、「懸想」的筆法，進一步使自我融入災區環境，其敘說：「其稍幸者乃有孤兒嫠婦哭其傍」（其五）；感嘆「強奪弱餐祇為飢，母牽子售非由忍」，詩作中刻畫人性在災難中的撕扯與掙扎，彷彿帝王所親睹。此外他更設想「此時破屋已無依，轉眼冬來更寒窘」水患雖過，然民居屋舍皆毀，倖存災民已一無所有，卻要面對緊接而來的冬日酷寒，顯得窘迫難堪。乾隆的描寫，試圖讓眾多讀者看到第一時間仿若親至現場勘災的帝王形象。如安寧所說「舉凡被災諸邑，孤

兒嫠婦之哭聲，蕩析離居之景象，廣廈細旃之上，如耳聞其聲，如目擊其狀。」

⁶²乾隆撰寫此詩時，應當是十分用心地揣摩災民心情。《清實錄》亦曰：「以此非常之災，朕覽奏徬徨軫惻，寢食爲之不寧，惟有速籌補救，庶災黎得獲安全。」

⁶³乾隆急於表明自我企盼黎民百姓得以恢復安定的心跡，並於此詩序言亦提到：「然遙顧災黎，憾憾不能去懷」、「不為空言徒罪己」，接續著傳統政教賦予天子的使命，乾隆除在詩中透露出「民胞物與」的襟抱，更採取實際救災行動，意欲證明己非徒然空言。是而帝王雖與災區有千里之隔，但他依然想方設法，試圖俯察底層人民的心聲。簡言之，乾隆是以「詩作」的書寫代替了實地勘災，作為一種安撫民心上的補償。安寧說乾隆帝「罪己之思，一夫不獲之念」，⁶⁴即是乾隆詩中所謂的「不必眼見涕洟瀾」（其五）。乾隆的真實心意究竟如何，我們在層層堆疊的文字掩蓋中雖難以得知，不過，倘若人君還有一「己飢己溺」之心，自然能對生民塗炭產生相應的悲憫。因此至少在詩作中，乾隆所欲表達的是：人民亦為我手足、親人，故其所感所受，我皆明瞭，故能予以「同情的理解」。

除了情緒上的感慨，乾隆也有意用說明政府採取的實際行動，刻意展現其責任感及能力，避免為人詬議。因此詩歌第六、七首羅列許多事後補救方針：「截漕蠲稅麗示概，調劑詳籌牧臣職。倉儲庫平莫吝慳，墨吏豪胥戒侵索。」（其七）大抵而言為：開倉發儲賑救災民、蠲免災戶賦稅、截漕抑洪、禁止官吏豪強趁火打劫，⁶⁵於是透過詩歌的譜繪，乾隆「視民如親」的襟抱又進一步在其詩作中彰顯、強化。

⁶² 《滄浪亭志》，卷首，頁 6b-7a。

⁶³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98，頁 11a-11b，總頁 4322。

⁶⁴ 《滄浪亭志》，卷首，頁 7a。

⁶⁵ 清代水患頻仍，根據相關規定，清廷救災與事後善理的一貫措施大抵如下：一曰備浸；二曰除孽；三曰救荒；四曰發賑；五曰減糶；六曰出貨；七曰蠲賦；八曰緩徵；九曰通商；十曰勸輸；十有一曰興土築；十有二曰集流亡；並且，朝廷對災情的即時通報

此外，乾隆〈江南潮災歎〉序言更云：「用示督撫諸臣兼以自訟」，「自訟」一語展現出帝王視民如傷之襟抱，同時亦是帝王責任心的發顯；「用示督撫」則是帝王統御領導能力的展現，有著教化與宣導的意義。可見乾隆在此番江南水患事件的處理心態上，隱隱以古代賢君聖王的標準自期，是一種服膺於儒家文化傳統政教的心跡與實際作為。從性質上來說，乾隆〈江南潮災歎〉基本也屬於帝王有關政教治道的宣告，目的欲使百姓知曉帝王和朝廷對此次水患並非「無感」，而是有確切的作為來進行災患的對治。不過大抵而言，乾隆這組詩作仍可看出帝王刻意言說與營構自我形象的痕跡。

綜觀康熙與乾隆的書寫，可見最高統治者對天下治道的關懷與責任感。兩位帝王書寫內容的主旨雖類近，但兩者動機卻略有差異。康熙賜予吳存禮詩、聯各一，從內容看來，是單純對吳存禮在任政績的肯定與期勉，帝王內心非有意主動公告，更未必欲將之和滄浪亭作特定聯繫；然相對而言，乾隆曾駐蹕滄浪亭並留下以「滄浪亭」為名的詩作，則他在滄浪亭中留下對官吏的箴誡，應多少受到康熙御書的影響，但又比之更具主動意味。此外，現存資料中雖無直接的證據可說明乾隆有意將〈江南潮災歎〉立碑刻石，然乾隆創作此組詩歌，除因江南水患的特定創作背景外，他應有意識預期自我的詩句文字將被轉化鐫刻，成為一份帶有政教宣告的文字。因此，他將此詩交付安寧昭示，並非如康熙皇帝單純將御書「賞賜」吳存禮，乾隆更有試圖展現自我帝王權威與愛民形象的心態在其中。是故我們可說，雖然康熙、乾隆未必親自指定滄浪亭做為御書的展示地點，但從帝王的書寫到頒布，乾隆可謂比康熙更具主動傳布教化的意識。

亦有規定：凡地方災者，必速以聞，遂定期災分而題焉。罪其匿災者、減災分者、報災之不速者。見清·托津等撰：《欽定大清會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卷12戶部，頁19b-22a，總頁638-643。

四、地方官員詮釋下的御碑與園林政教精神的建立

帝王書寫以石刻的方式被引介進入園林，無論是吳存禮或安寧，他們既是有意識攜帶帝王書寫進入滄浪亭的引介者，同時亦是帝王書寫的讀者。他們在碑文後，書記立碑源起，代表他們對帝王心跡的接受、詮釋。而他們的接受、詮釋，說明御書在園林空間中的象徵意義，更是使這些帝王書寫影響、改變滄浪亭空間意義的直接性關鍵。並且，在吳存禮、安寧之後主持重修滄浪亭的梁章鉅、張樹聲，也同樣對滄浪亭中的御碑有所解讀，持續強化著御碑對滄浪亭空間意義的影響。

從上述對康熙、乾隆御書內容的分析，可見二位帝王皆服膺於中國儒家政教文化傳統對於最高統治者的期待、標準。故無論是帝王對官員的箴戒、訓勉與要求，抑或對受災戶的告慰，「仁民愛物」是其中的核心目標，亦為歷任重修滄浪亭的地方官員所遵循、認取的精神。凡與滄浪亭空間相關聯的官員，無不朝此方向努力，並試圖強調園林在「養身修己」的功能之外，還必須存在一份「仁民」、「安民」政治理想。

（一）、立碑者的詮釋

關於這份「仁民」、「安民」的政治理念，吳存禮於御碑後的撰記石刻就已提到：

陛辭之日，天語諄諄，教以察吏安民之道……蒞任之日，與官吏士民等相見宣揚皇上德意，旰食宵衣，惟以愛養斯民為務。⁶⁶

⁶⁶ 《滄浪亭志》，卷首，頁 2a。

帝王以「察吏安民之道」諄諄教誨，官員則兢兢業業、步步遵循。吳存禮領受這份帝王訓勉，成為聖意的宣揚者。而又云：

命工選石恭勒御書，輝光燭天，與日月並麗。非敢以臣一人之私榮，誇耀於江南士庶。誠願蒞茲土者，肅瞻於下，如趨闕廷而聆聖訓，恪共乃職，罔敢怠遑。而是邦之民，亦得仰觀傳誦。共知今日之士食舊德，農服先疇，徜徉化日之中，優游浩蕩之宇者，皆聖天子勤勞庶政，視民如傷，深仁厚澤，涵濡煦育，積數十年以致。四方清晏，海內乂安，人被樂利之休，戶有弦歌之化，雖至田夫野老，於耕鑿作息之暇，安有不懼忪踴躍、擊壤謳歌，咸祝聖壽於億萬斯年者乎？⁶⁷

吳存禮將帝王書寫的文字轉化為石刻，立碑建亭，並有清楚的動機說明：吳氏自言建亭立碑「非敢以臣一人之私榮，誇耀於江南士庶」，表面雖未明言，但在話語的反面，恰好可窺見其欲透過御碑來顯揚自我名聲的企圖，只不過不敢明言罷了；故吳存禮再三強調，設立御碑不只為己，而是有意將皇恩澤被擴大於地方百姓。然無論吳氏設立御碑的原初心理動機為何，我們至少可以觀察到，他使御碑進入滄浪亭，其實還具有政治教化的企圖。吳存禮忖度園中御書碑亭建成後，四方遊人來觀，則官員「如趨闕廷而聆聖訓」、地方民眾「仰觀傳頌」。在吳存禮的詮釋下，康熙的帝王書寫內容具有了「軫念窮黎，勉循厥職」的意義；而其視王者形象為「勤勞庶政，視民如傷，深仁厚德，澤涵濡煦」，更是一位地方官員謹恪遵道，服膺政治權力中心的模範，從而御碑也具有了帝王告諭的效果。因此，吳存禮所設立的御碑，便等同帝王化身駐蹕，使滄浪亭空間充滿政治宣教的力量。而吳存禮在滄浪亭立碑宣揚聖教德政的同時，他之前甫到任時「案牘聚集，朝夕披閱，刻無寧晷」戮力從公的精神，使得轄區「浹歲

⁶⁷ 《滄浪亭志》，卷首，頁 3a。

以來，吏民樂余之簡靜，相安於無事。」⁶⁸從另個角度而言，吳存禮孜孜不倦以致官民相安，其政績也恰好正符合其對帝王心意的解讀與實踐。

繼吳存禮之後將皇權引入滄浪亭的安寧，身為一位處理水災的主事者，同時是皇帝諭令的宣告代表。安寧將乾隆皇帝〈江南潮災歎〉與漢武帝的〈瓠子之歌〉進行對照，並對兩者之形象進行詮說，安寧言：「王言禹湯罪己之思，一夫不獲之念，惻然溢於言表，視漢武瓠子之歌，徒諉不仁於河伯；周宣劬勞之詠，難安中澤之哀鴻，以古準今，真未可同日道也。」⁶⁹認為乾隆在〈江南潮災歎〉中透露的情感，以及所欲傳達對民瘼的悲痛，與漢武帝面對黃河決口的態度相比，實更具古之聖王風範。武帝元封（BC.110-105），黃河瓠子口數度決堤，漢武帝親自率領群臣百官前往當地治水。⁷⁰由於缺乏材料（用以抑塞洪水的竹木），⁷¹加以水勢過激，屢屢失敗。武帝有感治水不成，遂作〈瓠子之歌〉：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難。塞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頽林竹兮捷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⁷²

⁶⁸ 《滄浪亭志》，卷3，頁10a-10b。

⁶⁹ 《滄浪亭志》，卷首，頁7a。

⁷⁰ 〈河渠書〉：「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竇決河。」，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卷29，頁1412-1413。

⁷¹ 「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同前註，卷29，頁1413。

⁷² 同前註，卷29，頁1413。

從歌詩中的幾句：「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搯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由此可以看出漢武帝將整起決堤事件怪罪於河神與地方人民的諉責心態。⁷³而安寧似乎有鑑於此，因此他從古今帝王面臨水患的感嘆，試圖透過對詩作的詮釋，和乾隆以詩作試圖申說自我盡心盡力的意識相配合，進而為乾隆消解、遮擋可能招致的抱怨與負評，並形塑出帝王親民憂民的形象。

司馬遷《史記·河渠書》文末贊語言：「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⁷⁴司馬遷對黃河決口造成生民塗炭，既「悲」政府無力救民眾於水火，亦感嘆人力面對天然災害時的微渺與不足。而乾隆皇帝對於強大的洪水肆虐，也確實有「夫六幕不調，洪波不警，伊誰之咎歟？」⁷⁵的無奈；或是「縱有禹也應束手，胥為魚矣為增哀」人事難與自然強大力量對抗的嘆息。安寧認為乾隆作〈江南潮災歎〉，以示其不迴避主政者應負起的政治責任，甚至極言「補救惟應盡人力」。但乾隆在詩作中也提到：「潮災數十歲一遇，不先不後於茲值」，則不免如漢武有隱約諉責之心態。而安寧迂迴避此不言，反是強調乾隆在整起事件的對治、補救上所展現出積極、正面的態度，意圖塑造出乾隆模範王者的樣貌。是而安寧在〈御書潮災歎〉後的碑記，透過詮釋和補充說明，豎立起乾隆仁民、恤民的美好形象。並且，安寧亦詳述當時政府救災補償的緊急處置措施，具體陳述帝王將救災心意化為實際行動的展現。⁷⁶簡言之，安寧透過

⁷³ 阮芝生：「人力未盡，便歸天事，災及黎民，由不自責而責人。……史公所傷痛者，武帝有求仙之心、無恤民之意，以瓠子之決而歸之天事，致使久不復塞，令民長陷水深之中，而猶於〈瓠子詩〉中譴神罪人。見〈《史記·河渠書》析論〉，《臺大歷史系學報》第15期（1990年12月），頁73-78。

⁷⁴ 《史記》，卷29，頁1415。

⁷⁵ 《滄浪亭志》，卷首，頁4b。

⁷⁶ 案安寧的紀錄，此次江南水滂，除了災後修整廬舍、掩埋屍棺，更以蠲租、發帑為主要補救措施：「自八月起，視災重輕，撫賑三、四、五月不等。又自正月起，格外加

對帝王御書的詮釋，填補乾隆〈江南潮災歎〉難以自言的婉曲心態，進而闡釋乾隆詩作中期待「責己以安民」的意圖。而安寧還將御書〈江南潮災歎〉連同自我的碑記，一併勒刻於滄浪亭中，使文字轉化成實質性的石刻，代替了帝王的駐臨，並透過對詩作的詮解，營造乾隆仁慈愛民的聖王形象。因此，帝王的形象和政府教令，透過安寧的解讀和立碑，成為一種明顯的政教之力，矗立於園林空間。是故，從帝王的角度而言，滄浪亭中的御書是作為乾隆自身無法親臨災區現場的補償；以官員的角度來看，則是安寧在傳達聖意的同時，也一併賦予滄浪亭空間政教意義的象徵。

（二）、園林續修者對御碑的詮釋

道光年間，梁章鉅於江蘇巡撫任上重修滄浪亭，對吳存禮於滄浪亭銘刻康熙皇帝御書一事甚表認同，故其於撰修《滄浪亭志》時，遂將康熙、乾隆二帝之御書，置於篇卷之首，命曰〈宸翰〉，並言：「今謹首錄以為全書冠冕，使凡遊斯亭者，仰瞻天藻，各凜位思，以益勵其先憂後樂之心，庶不僅為範水模山之助云爾。」⁷⁷梁章鉅指出，滄浪亭在「遊觀」的功能之外，還存在所謂「各凜位思」、「先憂後樂」這種對於在位士大夫的勉勵。梁章鉅有意對士大夫以及包括自身在內的地方官員們進行呼告，恰與吳存禮將康熙御書勒石以凸顯帝王對官員勗勉的舉措遙相呼應。並且，梁章鉅自己的重修記亦提到：

則一亭之脩，而異日民情因之可見，其何敢不勗焉？顧予營是役，不特侈觀美，耽燕遊所弗願也，及好古自命，振厲風雅，與商邱輝映後先，尚無與於敷政庇民之要。竊謂守土吏，惟舉墮補闕戒因循耳。前既葺可

賑一、二、三月不等。計先後賑恤折色為銀，六十五萬六千七百有奇，蠲免崇明一歲額賦二萬九百有奇。」，見《滄浪亭志》，卷首，頁 6b。

⁷⁷ 《滄浪亭志》，卷首，頁 1a。

園以恢講舍，修名宦祠以崇祀典，近復有疏浚吳淞之役，而亭適落成。蓋斯亭於純廟宸蹕所經，天章頒寵，照耀川古，儻失時不治，久益荒廢，將何以宣上德？況伏覩聖製，濯纓託意，而諄飭于大法小廉，勉實副名，是尤予小臣循環莊誦、夙夜所求，所以報稱而無負者矣。⁷⁸

所謂「倘失時不治，久致淪廢，將何以宣上德」，梁氏重修滄浪亭的動機，有一部分是擔心當園林必然面臨物質性的頹圯命運時，帝王的聖意將無法宣達予後人知曉。因此，重修園林除了是不使「上德」被後人遺忘，同時也是朝廷命官再度對園林空間的教化意義進行認取、強化。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梁氏重修滄浪亭時，將滄浪亭與「葺可園以恢講舍，修名宦祠以崇祀典，近復有吳淞之役」一連串「振厲風雅」等敷政庇民工作等量齊觀。故滄浪亭的建成，反映著當地的民生情狀，所謂「一亭之脩，而異日民情因之可見」，既象徵梁章鉅勤政理民的治績，亦為提振地方風俗的期盼。此外，其云「況伏覩聖製，濯纓託意，諄飭於大法小廉，勉實副名，是尤余小臣循環莊誦、夙夜所求。」則是指地方官員凡來遊滄浪亭者能因御碑而知曉自身當恭循聖誡、黽勉從事。

藉由亭記的文字書寫，梁章鉅再次認取了園中帝王御書石碑在政教治道上的呼告，並且也說明：公共、開放化的滄浪亭，是一個能對普羅百姓宣揚皇恩，同時又是惕勵士大夫、官員勉力從公為民的政教空間。因此梁章鉅重修竣工之際，有詩云：

輦路春更綠，翠華記南來。宸情樂山水，睿藻輝池臺。圖書重林壑，邱垤成崔巍。列朝汪濊恩，沾被周九垓。敬告吳父老，樂利蒙滋培。煌煌

⁷⁸ 《滄浪亭新志》，卷2，頁1b-2a。

卹民意，天語光娥羲。假山而真水，濯纓知屬誰。勉實斯副名，至教兼露雷。宜切位思凜，敢言懷抱開。憂樂孰後先，煥然資雅才。⁷⁹

可以看出梁章鉅認知中的滄浪亭，刻蝕著帝王御遊的痕跡；而其詩作則反映出：地方民眾因聖上善於體恤民意而「樂利蒙滋培」；地方官員則面對聖訓，循名責實，兢兢業業於政教布施。是故，帝王的心意，已然被地方官員解讀、轉化為一份直接影響滄浪亭的政教之力，而在滄浪亭空間中展演。

此後張樹聲的〈重修滄浪亭記〉云：

蘇子美滄浪亭，自宋至明季興廢之不常也久矣。國朝康熙間，宋中丞瑩葺而復之，為觴詠之所，風流文采，藉甚於時。迨巡撫吳存禮恭奉聖祖皇帝賜詩御書，勒碑建亭於其地；高宗南巡，駐蹕留題，即滄浪自取之旨，往復申警，訓誡臣工。於是，縉紳學士、壤叟衢童，與夫寓公過客，遠方之人，莫不瞻眺嘆誦，以斯亭為榮寵。而官司土者，典守景式，由不敢以或忘。道光丁亥，布政使梁公章鉅重修之，巡撫陶公澍復得吳郡名賢畫像五百餘人，鈎摹刻石，建「名賢祠」於亭之隙地。每歲以時致祭。蓋祠與亭不相襲，久之，指目者猶曰滄浪亭云。同治癸亥，樹聲治軍來吳，維時公私百物，一切蕩盡，求所謂亭者，已不可復指識。壬申八月，被命權撫是邦，則壇廟祠宇，公廨試院，官司所有事者，皆次第修建，而是亭亦初作。⁸⁰

張樹聲在太平天國亂後奉命巡撫吳地，他抱持著和梁章鉅類似的心態，在一連串與官方建築相關的重整清單裡，滄浪亭也被列入其中。在張樹聲的觀點中，園林與「壇廟祠宇」、「公廨試院」同樣具有政教的象徵意義。面對滄浪亭的

⁷⁹ 〈重修滄浪亭紀事〉，《滄浪亭新志》，卷3，頁11b-12a。

⁸⁰ 《滄浪亭新志》，卷2，頁4b-5a。

園林歷史，在蘇舜欽之後，張樹聲所追索與認取的，是宋軫以降官修園林一脈的歷史記憶，而二位帝王的御碑更是他所強調的園林印象。此外，張樹聲也重修了當年陶澍所建之「五百名賢祠」，其中陳列蘇吳地區由春秋至清朝五百多位名賢之石刻圖像，湯金釗有題跋云：

昔人垂教，往往取古人事蹟可為法戒者，圖其形狀使人觀省，蓋鑒其氣貌，較諸空言記載為尤警切動人也。吳郡代有名賢，遊宦至是邦者亦多傑出之士。湘舟心慕之，非好善之篤，而能如是乎？觀是冊者，咸知愛慕而興起，則其重教之功，為不淺已。⁸¹

湯氏直指這些名賢圖繪的目的，在於使各類遊人「景賢仰止」，故「五百名賢祠」實兼具地方文化精神與官方教化之意。由張樹聲整建的五百名賢祠，原本與滄浪亭有所區隔，此時卻被視為滄浪亭的一體，即「蓋祠與亭不相襲，久之，指目者猶曰滄浪亭云。」⁸²五百名賢祠具有的文化政教意涵融入了園林空間，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對於「滄浪」名稱的意涵，張樹聲有所體察、詮釋：所謂「即滄浪自取之旨，往復申警，訓誡臣工。於是，縉紳學士、壤叟衢童，與夫寓公過客，遠方之人，莫不瞻眺嘆誦，以斯亭為榮寵。而官司土者，典守景式，由不敢以或忘。」亦是對於朝廷權力中心的遵仰和呼籲。是而原本蘇舜欽將園林取名「滄浪」，求取「自勝之道」，⁸³經帝王的書寫、官員的詮解，已不再是一種文人隨順處化或榮辱自取的遁隱心態；而是更轉進一層，成為儒家所謂「榮辱自取」的概念，警惕在職官員潔身自好、勉力為公的積極性訓勉。帝王象徵的教化之力，在一座公共、開放的園林空間中進行展演，是故凡所有入園遊觀

⁸¹ 《滄浪亭新志》，卷4，頁4a-4b。

⁸² 《滄浪亭新志》，卷2，頁5a。

⁸³ 《蘇舜欽集》，頁158。

的「縉紳學士、壤叟衢童，與夫寓公過客，遠方之人，莫不瞻眺嘆誦」皆籠罩在這份教化之力之下，滄浪亭乃成為眾人認取的政教指標。

而張樹聲在滄浪亭竣工後言「於以上逛天和，阜成民俗，百廢具舉，將遠追百年以前之隆，則是亭之成，實為之兆，其非奢望也。」⁸⁴對張樹聲而言，修復滄浪亭也是如同梁章鉅帶有「宣上德」的心理動機。因此，從吳存禮、安寧設立御碑，再經梁章鉅、張樹聲等人的重建，眾官員對御碑的認取，進而使滄浪亭空間增加了具有政教功用的景觀，使之成為地方政教中心的明顯指標。

（三）、儒家園林精神的成型與實踐

從上文中我們可看到，滄浪亭被視為一政教的空間，而「政清民安」乃是園林空間的象徵。然而這份由帝王到官員一至性的心願、理想是否真得以實現？滄浪亭空間代表的政教影響力究竟如何？從張樹聲重修記文可知，當滄浪亭經過太平天國之亂而破廢，從張樹聲手中重建時，官員們「勉實循名，欽承列聖彝訓」，⁸⁵不敢忘卻帝王勗勉與箴誡；「都人士景行先哲，群有奮乎百世之心，治道懋而豐化興。」⁸⁶於兵燹破殘中，官民齊心，勉力上進。滄浪亭作為一處具有傳統政教力量的空間，代表著地方政教風行草偃之精神象徵，亦為民安物阜的徵兆。故上述清代官員重修滄浪亭的行跡，恰如宋代官員修築「郡圃」，修園的舉措中實帶有一份政安民阜的宣示之意。

因此，無論是康熙的官箴、乾隆的〈江南潮災歎〉，亦或吳存禮、梁章鉅、張樹聲重建滄浪亭所秉持的理念，從皇帝以至地方官員，其終極關懷皆在「安民」。猶如當年當年孟子勸告梁惠王「與民同樂」之精神，滄浪亭在成為實踐政治教化之精神標的之同時，也被賦予了儒家園林的性質。

⁸⁴ 《滄浪亭新志》，卷2，頁5b。

⁸⁵ 《滄浪亭新志》，卷2，頁5b。。

⁸⁶ 同前註。

而在此教化空間性質中，園林本具的賞玩功能與遊觀特質，雖然能夠滿足「清遊」與「休閒」的想望，但對官員而言，除了遊賞休閒，園林依然有更重要的意義，如梁章鉅言：

共聽楓林韶濩聲，秋光正滿闔閭城。清風明月原無價，近水遙山倍有情。
樂在憂先吾豈敢，天從人願事方生。朝來佳話傳吳下，賀九還兼誌落成。

87

詩中梁章鉅標舉「樂在憂先」的精神，他認為滄浪亭園林不僅是一處休閒之所，更必須是完成民安物阜的使命後，方能以眾樂為己樂的休閒處所。他有意凸顯、告曉：凡遊斯亭者，須有「先憂後樂之心」，方不致徒逞耳目賞娛而遺忘自身的為官之責。而這種「先憂後樂」、「樂在憂先」的精神，也為時人所認取。孫義鈞為梁章鉅繪製《滄浪亭圖冊》時即言：「皇華甄輿頌，惠政燠且優。民隱燭纖細，涵鑑澄清流。展如采風土，攬奇肇篇陬。」⁸⁸除描寫亭子外，還關照滄浪亭本身具有的惠政之象徵。並以滄浪園林水景喻指地方官「涵鑑」民隱，體察民情而振恤之的風範。故原本象徵隱逸解脫的滄浪之水，在此成為了積極主動入世、鑒察民心的治政之道。

或如吳慈鶴〈題滄浪亭圖〉云：

清風與明月，未肯游朱門。非抱九仙骨，邱壑詎所敦？滄浪一灣水，名以子美存。荒寒七百載，蒞此繡斧尊。先生宏開濟，餘事能雄文。隻手障淮海，黃流縮崑崙。棠陰昨聽訟，肺石無冤民。不聞鞭扑施，新詩清且溫。爬梳出嘉樹，洗刷撐雲根。泛以無心舟，招彼離岫雲。青山喜公來，競獻笑與顰。終日不肯去，相對如弟昆。禽鳥喜公來，和鳴送朝昏。

⁸⁷ 《滄浪亭新志》，卷3，頁12b。

⁸⁸ 清·孫義鈞：〈為蒞林先生圖滄浪亭冊既成既戌徵詩盈卷重命題句復成足篇〉，《滄浪亭新志》，卷3，頁16b。

草木亦忻暢，雖秋意如春。我本部下民，未能飲公醕。長謠出肺腑，字字皆天真。終看把齋鉞，政暇理角巾。余亦荷簔歸，從公垂半綸。⁸⁹

從所謂「隻手障淮海，黃流縮崑崙。棠陰昨聽訟，肺石無冤民。不聞鞭扑施，新詩清且溫。」可看出梁章鉅治理吳地的成績，梁章鉅屢次整治當地水患，而原本人多事繁的吳地，亦因梁氏公正嚴明的持政而人人心悅誠服。是故，當遊人來遊滄浪亭時，所見「青山喜公來，競獻笑與顰。終日不肯去，相對如弟昆。禽鳥喜公來，和鳴送朝昏。草木亦忻暢，雖秋意如春。」園中萬物與時序一片和諧融洽之景，恰好對應吳地在梁章鉅治理下安和樂利的圖景。是而上述梁章鉅提出的遊園觀，也以自身懇切的政治實踐得到印證。

是而可見，在儒家政教理想影響下的滄浪亭，帝王的告諭、官箴與士大夫經國濟民的理念相互結合，成為士大夫遊覽滄浪亭時醒目的諄諄勸戒。吳存禮、安寧毋寧是此項精神的開創者；其後梁章鉅、張樹聲以宣揚上意為目的的重修工程，這些官員彼此之間彷彿有著共同的默契，先後解讀帝王意欲承擔傳統政教理想之心跡，也同時不斷強化滄浪亭的政教象徵，使之具有一份「振厲風雅」的精神典範。而吳、梁、張等人勤勉從政，政清人和與物阜民豐的政績，也確實達到了帝王的期勉。⁹⁰並且，梁、張等人追求眾民安樂來遊之「樂」，更反映這些地方官員在觴詠遊樂的空間感知外，還有類近於范仲淹所謂「先憂後樂」，屬於更高層次士大夫理念的實踐與追尋。因此，滄浪亭可謂是這些重修者對儒家安邦樂民理想進行認取與實踐的空間。

⁸⁹ 《滄浪亭新志》，卷3，頁17a-17b，總頁71。

⁹⁰ 梁章鉅在江蘇巡撫任內，亦解決了地方嚴重的水患問題，他自言：「救荒事極繁重，而其綱領不過此數端，求可以一言蔽之者，則盡心二字而已。」對救災盡心盡力的態度，與乾隆〈江南潮災歎〉中「誰云救災無善策，盡一分心一分益」之心態，隱然有遙相呼應的意味。見梁章鉅：《退庵隨筆》（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卷8，頁19b。

回顧昔年的蘇舜欽，亦有許多描繪現實民生疾苦、關懷民瘼的詩作。⁹¹他的這份理想與熱忱，雖因宦途浮沉終究無法達成；然而在其建立滄浪亭百年後，園林成為了民安物阜精神的象徵性空間，清代帝王與朝廷命官們對滄浪亭的期許，可謂實現了當年蘇舜欽所追求的「外王」理想。若舜欽有知，應能獲得些許的慰藉吧！

（四）、御碑對園林物質性存續之影響

當御碑為滄浪亭地景鐫刻出新的空間意義時，重修者也對這座帝王遊跡與筆跡曾經停留過的園林有所發想。梁章鉅《滄浪亭志·序例》有言：

滄浪亭，城南一杯土耳，翠華南巡，屢承清蹕，雲爭霞蔚，寵被天章，
洵泉石之殊榮，山林之異數也。⁹²

認為被帝王造訪過的滄浪亭，得到了「背書」，地位抬升，而不再和其他景點同列一班，可說是「泉石之殊榮，山林之異數」。梁氏以人之命運譬況滄浪亭，認為滄浪亭榮獲恩寵，是大為幸運之事。有關帝王對景點名聲的宣揚，歷史學者已有關注，並指出：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有許多旅遊地景，因著帝王的「加持」，為原本地景增益了新的景觀，並讓該處聲名遠播，吸引大量遊客。⁹³滄浪亭中的

⁹¹ 如其作〈吳越大旱〉：吳越龍蛇年，大旱千里赤。尋常秔稌地，爛漫長荆棘。蛟龍久遁藏，魚鼈盡枯腊。炎暑發厲氣，死者道路積。城市接田野，慟哭去如織。是時西賊羌，凶饑日熾劇。軍須出東南，暴斂不暫息。復聞藉兵民，驅以教戰力。吳儂水為命，舟楫乃其職。金革戈盾矛，生眼未嘗識。鞭笞血塗地，惶惑宇宙窄。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冤對結不宣，衝迫氣候逆。二年春及夏，不雨但赫日。安得涼冷雲，四散飛霹靂。霽沱消浸癘，甘潤起稻稷。江波開舊漲，淮嶺發新碧。使我揚孤帆，浩蕩入秋色。胡為泥滓中，視此久戚戚。長風卷雲陰，倚桮淚橫臆。《蘇舜欽集》，頁 16。

⁹² 《滄浪亭志》，序例，頁 2a-2b。

⁹³ 關於政治權威介入地景造成的轉變，巫仁恕〈旅遊地景的再現〉一文中有詳細的論述。從其羅列各種證據論述中可知，凡皇權所到景點，經過皇帝親自題咏或手書匾額等「加持」，往往使其聲名更勝、更具遊觀之吸引力。不僅成為地方志中詳細載入的景點，

御碑作為一處新立的園林地景，如張樹聲所說：「滄浪亭垂今千載，靈秀所鍾，宸翰天章，重光累曜。」⁹⁴為滄浪亭帶來更多的名聲，也豐富了滄浪亭的地景意義。在政治權威的介入下，地景之名更能顯揚。然園林是否能因此而獲得存續不朽的保障呢？譬如吳崇禮重修滄浪亭時，便期待滄浪亭能夠在皇恩沐浴下千載永傳：

俾後之覽者，知宇宙間靈異之境，必有待於聖主之文章。若日月之麗於天，輝光照耀，互萬古而不可掩茲地。自吳越有國時，歷宋、元、明，勳戚權貴據為苑囿，旋興旋廢，誠不足道；即才人傑士，其英風豪氣足蓋一時者，雖不至泯然俱盡，而其遺跡湮沒於荒煙蔓草間者，何可勝數？則滄浪之因御書而益增其勝，藉以垂名於不朽，詎不然歟？⁹⁵

吳存禮期盼在設立御碑後，滄浪亭便能垂名不朽。然從結果論，則吳存禮的心意顯然是落了空。滄浪亭於其後屢屢衰圯，故方有梁章鉅、張樹聲等人的重修。就此看來，對於園林物質性的保存而言，帝王也未能發揮相當其政治權威的影響力。即如張樹聲所謂：「興廢之不常也久矣」、「事之興廢固有其時」⁹⁶說明了滄浪亭於時空中屢興屢廢的命運，則御碑顯然無法對園林的存續產生相當的「保證」。亭子在自然時空的流變中，依然無法避免就荒之命運輪迴。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滄浪亭的園林實體雖無法因帝王的「加持」而延續千秋萬世、永不隳墮，但至少園林可以「重修」，重修正象徵著一座園林的新生及延續。而重修背後的動力來源，正來自於滄浪亭本身象徵的意義。如前述，設有御碑的滄浪亭是一處「教化精神標的」，而帝王「仁民愛物」的心跡，恰

更讓這些地方的遊記與詩文越來越多。見氏著《遊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出版社，2010年），頁163-167。

⁹⁴ 《滄浪亭新志》，卷2，頁5a。

⁹⁵ 《滄浪亭志》，卷3，頁11b-12a。

⁹⁶ 《滄浪亭新志》，卷2，頁5a、5b。

與士大夫發政理民的教化精神相符合，重修滄浪亭即意味朝廷教化力量與士大夫政治理念的實踐、彰顯。是故康熙、道光時，吳崇禮、梁章鉅、張樹聲相繼以「恢復聖意」為重修滄浪亭的主要目標。因此，滄浪亭的物質性園林雖不可避免在時間洪流中衰圯腐朽，但帝王與地方官員仁民愛物的一貫精神，彷彿成為一種吸引力，引導後代官員前仆後繼地以重修滄浪亭的舉動來完成此一使命。

園林雖可能就荒，卻因園林空間象徵的「政教理念」引發地方官員力倡「重修」，使之屢屢被重整。於是時空中興廢不定的滄浪亭得以延續、保存，也具備了另一種園林空間抵禦時間洪流侵蝕的不朽可能。

五、結語

自秦代始皇帝伊始，刻石、立碑便是君王威命與宣揚功業的象徵。有清一代，御碑成為滄浪亭的醒目景觀，亦是帝王書寫的一種展示。一般而言，除帝王直接性的詔告外，帝王書寫須經由地方官員的傳遞，諸如：宣教、公布聖諭等方式，才能對被統治者產生效力。意即帝王書寫為一「被攜帶者」，而地方官員則是「攜帶者」，官員們解讀、詮釋帝王書寫的內容並加以公布、執行。以滄浪亭為例，亭中的帝王御碑，不同於過往帝王主動勒誥刻石，而是必須經由官員的攜帶才能傳播，故屬於一種被動的存有型態。

當帝王的紙上書寫被地方官有意引介進入滄浪亭後，其書寫形式業已從原本的紙上文字，轉換為石刻碑誌。石刻後的御書，佇立於滄浪亭園林的公共性空間，經過了官員的詮釋，最終指向政治教化的意義方向。官員作為帝王書寫的「攜帶者」與「宣告者」，須肩負起宣達聖意的責任。吳存禮與安寧選擇主動設立御碑，故他們才是有意識，並以實際行動使帝王書寫對滄浪亭空間意涵

產生直接性影響的人。並且，無論是負責主導鐫刻立碑或主倡重修園林，官員們的心態與想法，代表對御碑內容的解讀與詮釋，亦是滄浪亭御碑意涵的一部份。簡言之，御碑是帝王書寫與官員詮釋下的產物。透過官員有意將之引入園林，進而賦予了滄浪亭在遊觀觴詠以外的空間意涵，也同時改變了園林的性質。

而御碑的政教意義與滄浪亭的空間性質，彼此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回顧滄浪亭的園林興修歷史，從宋代蘇舜欽建亭，到清代御碑進入滄浪亭後，滄浪亭已從文人自我的療傷處所、僧道清修的宗教之地，漸次褪去私密的個人性，成為一開放公共的空間。吳存禮或安寧為宣揚聖意，擇定滄浪亭為建立御書碑亭的地點，與園林空間自宋肇重修後具備的公共性，成為一種相互影響的雙向因果關係，意即：滄浪亭園林空間的公共、開放性，使園林成為一適宜宣導政教的處所，吸引御碑進入；而當御碑進入滄浪亭時，又同時使滄浪亭園林空間的公共、開放性漸次被強化。

滄浪亭御碑上的書寫內容，是帝王對吏治清明的規箴、關懷民生疾苦的話語，代表一種帝王的心跡與政教。其中，乾隆皇帝的〈御書潮災歎〉，更是帝王面對天災，反躬自省、關切百姓的心意。乾隆主動將其詩作交付官員公告，而安寧選擇用設置御碑的方式展現，君臣兩人的行動中，具有一種「皇權」傳遞及展演的意味。就御碑的物質性意義而言，御碑象徵皇權的駐蹕，而石刻碑銘相對一般紙墨素材，更為堅硬，且具抵抗時間朽蝕的能力，因此石刻御碑所代表最高統治者向眾人詔告教化的意味，更加濃厚、堅定。於是御碑在園林空間中，形成具有傳統政教精神的帝王典範。這份帝王典範，在吳存禮、梁章鉅、張樹聲次第重修滄浪亭的過程中反覆被提起、認取，進而凝聚成一股由帝王——官員、士大夫一脈相續接承的政教精神，形成具有權威性的官方教化力量。這股力量使往後滄浪亭空間中出現了許多與官方教化相關的建物如：御碑亭、五百名賢祠，和御碑之間形成「朝廷中央權力」／「地方文化特色」相互輝映

的情態，同時更強化滄浪亭空間景行行止的薰染、教化功能。並且，滄浪亭的空間特質，讓官員在觴詠清遊外得以觀政體察民心。因此，從遊人的詩作中，反映眾民來遊的熙攘圖景，使士大夫的遊園「樂」，成為一種自我政治理念的驗證和實現。因此，滄浪亭成為了地方政教的標誌，敦促著地方官員對園林空間屢屢進行修繕。由此可說御碑帶來的「政教功能」，使滄浪亭成為官員施展儒家治道安民精神的空間場域。

總的來說，帝王御碑進入滄浪亭後，成為園林鮮明的地景記憶，成為空間政教意義的開端，而為後代重修者所認取。帝王的諄諄告誡，讓滄浪亭的園林空間在遊賞休閒外，開始肩負起相關的地方教化責任。這與原初蘇舜欽以罪臣身分建立滄浪亭以避居調養、求取自勝的心念迥不相牟。而御碑的設立與地方官員的詮釋、解讀，也使滄浪亭具有傳統儒家仁民愛物的社會關懷象徵，在園林本有的遊觀棲逸之外，成為一處政教的空間，持續影響其後滄浪亭的重修、建設與書寫。因此，清代後的滄浪亭空間同時具有「觴詠棲逸」與「政教治道」的雙重性，帝王御書與其他遊賞、觴詠的詩篇並置，使園林空間意涵、記憶的延伸、繼承、開展向度更為廣闊，成為一種地景記憶的典範。這正是御碑對滄浪亭空間意涵的改造與新變，亦是御碑賦予滄浪亭園林空間的歷史、文化意義。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出版社，1977年）。
- 宋·蘇舜欽著，沈文倬校點：《蘇舜欽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明·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清·宋荦：《滄浪小志》（江蘇：江蘇書局，1884年）。
- 清·華聯出版社輯：《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
-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大清會典則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托津等撰：《欽定大清會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清·高晉等：《欽定南巡盛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梁章鉅：《滄浪亭志》，《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
- 清·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 民國·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民國·蔣瀚澄：《滄浪亭新志》，《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二、近人論著

巫仁恕：《遊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李宗維編著：《城市裡的山水情懷：蘇州園林》（臺北：旗林文化出版社，2006年）。

侯迺慧：《宋代園林及其文化生活》（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

三、單篇論文

阮芝生：〈《史記·河渠書》析論〉，《臺大歷史系學報》第15期（1990年12月），頁65-80。

曹淑娟：〈明清滄浪亭古園重修與歷史文化記憶〉，《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學生書局，2011年），頁297-329。

